



《追忆圣玛利亚女校》
徐永初 陈瑾瑜 主编
同济大学出版社

璀璨与苍凉

□张怡微

每年我都要带大一新生“行走上海”，完成通识教育的课程。学校分派给我讲解的路线是圣玛利亚女校原址、常德公寓、重华新村、平安戏院旧址及南京西路上其他的老剧院和老上海点心店等。有些地景，经常出现在经典的海派文学作品中。有一些则成为了著名电影的取景地。因为这样的因缘，有一本书，我每年都要读一遍，即《追忆圣玛利亚女校》。常读常新，一开始是为了寻找张爱玲，后来却在书中许多人的回忆中看到了更多人跌宕丰富的一生。上海圣玛利亚女校(St.Mary's Hall)成立于1881年，原名上海圣玛利亚女书院，1923年改名上海市私立圣玛利亚女子中学，建校以来亦称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在当年，这所学校招生对象多为中上等家庭的女子。许多战后女性科学家、律师、医生、教育家等都来自这所学校。《追忆圣玛利亚女校》并不是一本文学书，而是一组校史记录，以“圣玛利亚女校”系列命名，一共编了三本：《圣玛利亚女校(1881-1952)》《追忆圣玛利亚女校》《追寻圣玛利亚校友足迹》。其中，我最喜欢读的一本就是《追忆圣玛利亚女校》。书中记录了一百年前的上海、上海家庭和女性生活史、生命史，十分鲜活，又诚恳。

第一篇作者为鲁平的文章《我的母亲——“樊皇渡孀孀”》，写“母亲”是圣玛利亚书院1913届毕业生，“母亲”曾不顾父亲认为女孩子不需要上学的命令，也抵抗缠足，辛亥革命之后，更是带头剪辫子，坚决反对封建婚姻，居然在没有家人参加婚礼的情况下，举办简易婚礼，可见是时代先锋人物。1919届的唐赛云女士，在103岁高龄时写下回忆文章，说起学校位于圣约翰学堂(男校)的大校园内，她十一二岁时发现了竹篱笆边男生女生传纸条的秘密，很有意思。唐赛云女士出生于1904年，她的英语启蒙老师，是在虹口礼拜堂学过英文的奶奶。奶奶的英文好到什么程度呢？居然令她觉得在这样一所以英文教育为优的女校学不到什么新东西。另一位1935届的孔宝定则不这样认为，她在耄耋年纪回忆自己从宁波转学到圣玛利亚女校时，因为只会哑巴英语而自卑。与此同时，她也因为来到了此校，才接触到莎士比亚原著(1945届的应曼蓉女士在读书期间就写了一篇《莎士比亚戏剧与京剧的比较研究》，实在是时髦)。

也是在孔宝定女士的文章里，提到了校刊《凤藻》(Phoenix)，当时全班同学都去拉广告、筹资金，她是中文版的主编。这本校刊看似平淡无奇，因为张爱玲的关系，近年来不断升值，甚至成为了坊间非常高价的拍品。即使没有张爱玲的作品，拍卖网站上《凤藻》单期的价格都在20000元以上。1991年至1992年，一家影视公司到上海拍一部关于张爱玲的文献片，陈子善教授也是参与者之一，那时陈子善发现了1932年圣玛利亚女校的校刊《凤藻》，收入有张爱玲的作品。另一本同期的《凤藻》漂流到香港，被收藏家吴邦谋发现并收入囊中，如今已是海外孤本。而那位曾因哑巴英语而紧张的女同学孔宝定，后来又努力学习了第二外语俄语，并在华东师大成为教师，先教俄语、后教英语三十几年。令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是1948届顾美诚女士的文章。她写到自己1952年到北京矿务局工作，自学煤田地质与采煤学，大约到了1970年代后期，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在矿务局参观座谈，接待时要用英语。那时她已经三十年没有用过英语，在圣玛利亚女校的英语学习，直到那天才派上用场。这位聪明的女士，后来又自学了财会。有相似经历的还有陈佩美女士，解放后她在上海远洋公司工作，上世纪70年代，单位面临一项特殊的接待任务，要接受联合国科研专员的考察。她顺利完成了专题汇报。事后她对同事们说，“我们同班比我讲得好的同学多着呢！”

有些文章提到了餐饮、派对、友谊，有些文章会写到八卦。例如有一篇中写：“班上坐在最后排当中那个大美人叫杨蒙，她上课没书看，经常迟到缺席。一个学期结束，我还没和她说过一句话。没想到五十年代我在北京看香港古装片《王老虎抢亲》，她竟是片中女主角，艺名‘夏梦’……”还有一类学生，并不是因为家境优越而入校，而是作为教工或协助建校等方式获得入学资格，这些女孩深知机会来之不易，往往会更刻苦一些。时过境迁，这些细微的心路也被记录在这本书中。

百年以来，女性教育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伴随女性教育的发展，那些有血有肉的记忆心曲，随着大时代风浪去往世界各地的女孩们的故事，以校园生活史这一非虚构的形态保存得如此动人，实为难得。而女性的心声，经由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而获得的主体性，也是让这些非文学的材料有了文学性的真正原因所在。



《忧郁的热带》
列维-斯特劳著 王志明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人类学家的文化苦旅

□陆远

很少有一本严肃的人类学作品能像《忧郁的热带》一样在全世界引发如此广泛的、持续的影响。即便在初版将近70年后的今天，依然热度不减，好评如潮。尤其难得的是又叫好又叫座：一方面学术界一致推崇，另一方面人类学圈子之外的读者们也不吝致以最高的赞誉。评论家桑塔格在英译本出版不久就断言这本书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历史学家葛兆光说自己“从来没看过一本人类学著作，能写得这样引人入胜”；作家朱天文干脆就在自己的小说里大段摘抄这本书的原文；甚至不止一部走文艺路线的商业电影，把夕阳下手捧一本《忧郁的热带》定格为女主角的经典画面。不夸张地说，哪怕只凭借这一部作品，它的作者列维-斯特劳就可以毫无愧色地跻身20世纪最杰出人类学家的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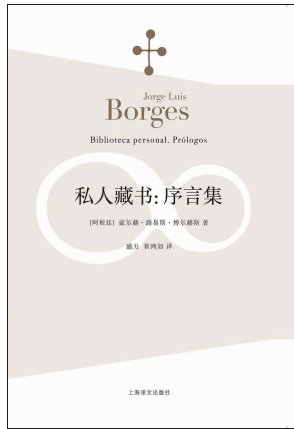
文艺青年喜爱《忧郁的热带》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本记录作者青年时代在巴西田野作业经历的作品，首先是一部充满异国情调的游记，一部文辞优美的散文集，对大部分读者来说，它饱含着一个中年人对时间流逝的伤悼。列维-斯特劳斯的敏感细腻，让人想到普鲁斯特；他的深沉幽暗，又具有波德莱尔的气质。事实上，作者最初确实是想利用人类学田野实践经验创作一部小说的，但在写了30页后，他放弃了，只留下一个浪漫的书名和一次辉煌的日落(第七章对壮美夕阳那一整章的细腻刻画，令人折服)。即便如此，文学界依旧没有忽视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因为它不是小说，法国龚古尔奖评选委员会还特地印了一份公报，表达了他们未能把《忧郁的热带》列入遴选范围的遗憾。

当然，列维-斯特劳斯的志向并不是做一个文学家，专业的学养不允许他“像那些随时准备被感动，随时要抒怀的文人一样，哆嗦着企图在蛛丝马迹的历史遗迹中夸张情绪”(周濂语)，他刻意要与20世纪中叶巴黎读书界流行的那种猎奇而肤浅的旅游文学划清界限。“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列维-斯特劳以此种悖论式的表达作为一部人类学游记的开端。言下之意是，尽管20世纪民用航空和旅游工业的发展，已能把西方游客送到最遥远的异国，为追求任何异调情趣的有钱人提供服务，但旅行和探险已经逐渐丧失其原有的“史诗般”严肃的光晕，泛化为大众休闲、消遣、娱乐、炫耀的方式，成为“一门生意”。观光客们躲在营地的围墙后面，用望远镜窥探异域文明，借以满足欧美人自以为是的傲慢。

与之相反，在诸如吐比卡瓦希普族、南比克瓦拉族、波洛洛族、卡都卫族等欧洲人所谓“未开化的野蛮民族部落”面前，列维-斯特劳充满了理解的同情乃至自责——对一种文明吞噬另一种文明的自责。对于他来说，这些随时都可能消失的土著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观镜者自身文明的状况。在亚马逊河的独木舟上，年轻的作者写道：“不管距离有多远，也不管这些社会和欧洲文明之间有多少中间人与中间社会，这些社会还是因为欧洲文明而支离破碎。对于一片广大的无辜的人类来说，欧洲文明等于是一个庞大无比的、也是无法理解的大灾难。我们欧洲人如果忘记这件大灾难乃是我们的第二个面貌的话，将是一个大错误”，“西方世界最有名的成就是它所显现出来的秩序与和谐，在其中孕育着一些前所未见的复杂结构，但为了这个秩序与和谐，却不得不排泄出一大堆有毒的副产品，目前正在污染毒害整个地球，我们在世界各地旅行，最先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的垃圾，丢在人类的脸上。”在20世纪50年代欧洲进步知识分子对战争和殖民主义激烈批判，对民族解放和平权运动奔走呼号的思潮中，《忧郁的热带》以特别耐人寻味的方式，呈现出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深刻思想与丰富内容；它基于作者在异文化世界的体验，基于不同文化对于超验精神的种种思索，反衬出对“起源于欧洲的现代文明怎样使人焦虑”这一重大而深切的文化问题的思考。

列维-斯特劳活了101岁，终其一生，他都没有摆脱“忧郁”的思想底色，这多少来源于他对于人类文明走向的担忧。在他身后，世界也似乎并没有如他所愿变得更和谐。而恰恰是在这个“文明的冲突”似乎愈演愈烈的时刻，我们需要重新想起这位“文化英雄”，无论时间上还是空间上，他使我们有可能站在一个遥远的地点，采取第三者的立场，从远处反观自己所属的社会，反思现代人自己的生活。就像桑塔格说的那样，“《忧郁的热带》之伟大，并不仅仅在于这种目光敏锐的报道，而在于列维-斯特劳利用他的经历的方式——他反思着风景的自然状态，反思着旅行的观念，反思着日落，反思着现代性，反思着识字与权力的关系”。

蒯人快语



《私人藏书：序言集》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著 盛力 崔鸿如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天堂图书馆的书单

□蒯乐昊

一场意外的选举结果，让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阿根廷。

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兹曾经说过，世界上有4种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以及阿根廷。显然，日本是个正向的特例，而阿根廷，则是反向的那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音乐剧《阿根廷别为我哭泣》，但步入现代社会之后阿根廷，眼泪从未断流：在20世纪初，阿根廷还是富甲一方、比肩欧美的大经济体，但现在的阿根廷，全年通胀率超过140%，外汇净储备深陷赤字，国家货币岌岌可危，在过去的160年里，阿根廷经历了16次经济危机，平均每十年一次。

对于这个在地球上离中国距离最远的国家。中国人最熟悉的不是它的政权更迭，不是它的经济民生，而是它的足球与文学。阿根廷足球为全世界贡献了马拉多纳和梅西，而阿根廷文学为我们贡献了独一无二的博尔赫斯——即使那些从未读过博尔赫斯作品的人，可能也听说过“交叉小径的花园”“天堂图书馆”……这是一名作家从写作者变为文化icon的明证。

“博尔赫斯，作家和自修学者，1899年生于当时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去世日期不详，因为当时作为文学品类的报纸在当地历史学家如今正在评述的那场大战乱期间全部遗失了……在文学方面，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些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某些致命缺陷。”

你以为这是后人对博尔赫斯的生平介绍吗？不，这是1974年博尔赫斯75岁时为自己写的伪造词条，因为不确定自己会死于何时，于是他捏造出一场历史性的混乱。并假托这是2074年在智利圣地亚哥出版的《南部美洲百科全书》中关于博尔赫斯的一段生平词条。在活着的时候穿越到未来并以回顾之姿态念出自己的死讯，这种扭曲时间与空间，混淆真实与虚构的手段，正是博尔赫斯最为擅长的拿手好戏。

“如果世上有天堂，那天堂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嗜书成癖的博尔赫斯这样说，他便是那个幸运的小子。小时候，同样热爱阅读的父亲在自家花园洋房中单辟出一间读书室，里面藏有大量珍贵文学名著，博尔赫斯自幼埋首书中，那是他的天堂。成年之后，他几乎终其一生都在天堂图书馆中忙碌。他历任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各公共图书馆的馆长，最后成为阿根廷国立图书馆的馆长，同时在大学中任教，虽然那时他的双目已经近乎失明，不知道是因为家族遗传(博尔赫斯的父亲亦患有眼疾)，还是被长期不休不眠的海量阅读毁了视力。他自嘲：“命运赐予我80万册书籍，由我掌管，但同时又给了我黑暗。”

但他依然在黑暗中著书立说，同时依然在母亲、妻子和朋友的帮助下阅读。《私人藏书》便可以视为这位天堂图书馆的守护者，为后来者列出的一份简明参考书单。在这本小册子里，博尔赫斯列出了62位作家、哲学家、科学家的85本著作，并挨个给出推荐理由，这些书集中体现了博尔赫斯本人的审美趣味，也坦承了他在文学上的来路。比如那本一举奠定了博尔赫斯文坛大师地位的《恶棍列传》，他老实交代道，其中很多资料依据和启发都来自马塞尔·施沃布的《假想人生》，他甚至不无得意地指出，文学评论界至今还无人发现这一点。

《假想人生》写于1896年，比博尔赫斯出生还早3年，但马塞尔已经“发明了一种奇特的方法。主人公是真的，而事情却可能是虚构的，甚至是神奇的，本书的特色正在于这种真与假的摆动”。显然，在这一点上，博尔赫斯受马塞尔·施沃布之惠甚深。

作为“作家中的作家”，你永远可以信赖博尔赫斯的选书品味。作为“作家中的考古学家”，你也永远可以仰仗博尔赫斯广博的语言能力。阿根廷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但博尔赫斯同时还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这成为了他全球涉猎典籍的内功心法。“让别人去夸耀他们写出的书好了，我则要为我读过的书而自诩”，博尔赫斯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个好作家，但我相信我是一个极好的读者。”

一本书不过是万物中的一物，直到某一天它找到了它的读者，是书与读书者的相遇，才形成了创造的闭环。因此，带上这本《私人藏书》，去你的天堂图书馆，开启激情借阅吧！

远见近拾

微言大义